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四一期 ——
(二〇一〇年三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3a)

| | | |
|--------|-------------|------|
| 【史海钩沉】 | 林彪在“二月逆流”前后 | 欧阳龙门 |
| 【史林一页】 | 百问九一三(八) | 舒云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林彪在“二月逆流”前后

• 欧阳龙门 •

要点：

1967年一月下旬，为了防止“一月风暴”引起的全国大乱影响到军队，林彪和几位老帅制定了“军委八条命令”，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同时，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在不同的场合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作法提出了指责。从1967年2月中旬开始，各地军方以“军委八条命令”为依据，对造反派冲击军队的过激行为进行反击，将大量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有的地方采取了开枪镇压、大规模逮捕等极端手段。因而形成了“二月逆流”，使文化大革命出现重大的逆转。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指责。当毛泽东发现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时，他通过中央文革发动造反派群众组织对“二月逆流”进行反击。不久，林彪也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并且配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需要制定了“军委十条命令”，在事实上否定了先前的“军八条命令”。此后，文化大革命再度出现大的反复。

毛泽东在为各地造反派群众组织平反、迫使军队转向支持造反派的同时，也考虑到稳定军

队。鉴于林彪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表态，毛泽东决定以林彪及其老部下为依靠来实现稳定军队的目的。

“二月逆流”在中共官方的话语中也称为“二月抗争”〔1〕，〔2〕。在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这样定义的：“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3〕

现在人们说起“二月逆流”，直接想到的就是“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但实际上并不仅止于此。事实上，由于“大闹”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在当时还有一定的权力，还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军队有实权和影响，更由于“二月逆流”之前、“二月逆流”期间军队的一些作法一度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林彪的支持，所以，“二月逆流”的在全国各地的影响比仅仅是“大闹”要广泛的多，波及到全国许多省，在很多地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4〕

接下来的“反击二月逆流”同样也不仅仅是毛泽东对“大闹”的斥责，也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各个方面的一系列活动。

“二月逆流”和“反击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中两个猛烈的急转弯。造成这种反复的决定因素当然是毛泽东本人。在这段时间里，林彪的所作所为也是颇为复杂的，决不是像中共官方所描述的那样，是“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5〕

一、“二月逆流”前的文革局势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7年1月中旬，各级党政机关基本上全部瘫痪。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带动下，夺权浪潮席卷全国，逐渐波及到军队。根据毛泽东“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军队开始介入各地的文化大革命。

军队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这一点地的态度是肯定的，他在《五一六通知》中指出“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6〕以后毛泽东本人不断地重复自己的这个观点。

196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写道：“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7〕

那么军队中哪些人是“走资派”呢？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8〕

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搞，冲击和动乱达到什么程度，毛泽东的态度则是犹豫的，常常是模棱两可，前后不一。

例如，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指出：“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9〕

这就使文革的动乱波及到军队，先是军队院校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把矛头指向本单位的当权派。随后四处串联，使部队文体单位、机关、医院纷纷动乱起来，冲击上级军事机关，以至于冲击各军、兵种司令部、国防部、中南海。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明白，搞文化大革命需要军队的支持，因此军队需要一定程度的稳定。所以，也有“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和散发传单”的指示（10），以及“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前有后”，“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叉开”的想法（11）。基于毛泽东的不确定的态度，副统帅的林彪的办法一是“口头上紧跟”，二是“行动上推托”。

“口头上紧跟”表现在“一切请示主席，一切遵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对主席的指示要坚持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12）

“行动上推托”则是尽量少表态，尽量回避矛盾。对此，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有具体的描述：当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学生到国防科委揪斗赵如璋的时候，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请示林彪该怎么办，林彪的答复是：“不用答复。”（13）（14）当秘书汇报各省、市委受到造反学生的冲击时，林彪说：“不要再讲了。”（15）

当军队院校的学生冲击国防部时，叶剑英和刘志坚报告林彪，希望林彪给出处理的指示，而林彪则对秘书说：“我没什么，就让他们去处理吧！”（16）

尽管如此，林彪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不一样的。林彪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升一批人的官，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17）。林彪在以后的行动中处处体现出这一点。

毛泽东要的是“天下大乱”（18），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革命”（19），这就不仅是要“升一批人的官，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而且要将机构整个砸烂。中央文革、红卫兵（保守的和造反的）（20）、造反派都是毛泽东实现“天下大乱”的工具。

林彪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有根本的区别。尽管林彪在口头上紧跟毛泽东、附和毛泽东，尽管毛泽东砸烂了党和政府的机构，军队的机构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当中虽然受到冲击，虽然有过局部的瘫痪，但是始终没有整个地砸烂。要将机构整个砸烂，这一点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文化大革命宗旨。具体到军队，毛泽东既有“砸烂”的一面，也有“稳定”的一面；林彪则始终是强调和坚持“稳定”的一面。

后来参与“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是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对于整肃刘少奇也是赞成的。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的人事变动可以看到：不仅仅是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上升到第二位，还有除了陶铸、陈伯达、康生上升到政治局常委以外，李富春也进入常委；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都进入了政治局（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已经是政治局委员）；（21）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在1966年1月由中央军委常委升任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已经是军委副主席）。（22）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作法有些意见，而且用中央的官样文章的话语公开表达出来。（23）

在“稳定军队”这一点上，林彪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几位老

帅和副总理的倾向表现得比林彪要明显一些，林彪在言词上要更显得“紧跟主席”。

林彪与几位老师和副总理的分歧在于“升哪些人的官，罢哪些人的官，保哪些人的官”。实际上几位老师之间也是有分歧的。例如下面我们会看到叶剑英和徐向前在这一点上的对立。

基于中央领导层的这种态度，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展开，军队在1967年1月开始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冲击。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任何组织、团体、个人，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包围、冲击国家机关、军事机构都是违法犯罪行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由于毛泽东将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认为“对反动派造反有理”（24），于是任何行为只要带上“革命”、“造反”的标签就可以横行无忌，就可以冲击一切。

如果说对于1966年8月前后红卫兵的暴行，毛泽东还可以赞赏、林彪与几位老师和副总理还可以沉默的话（25），到了1967年的2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被揪斗的人已经不计其数，其中许许多多的人遭到毒打和虐待，省、部级以上的干部中已有张霖之、赵尔陆、陶勇被斗致死，阎红彦、卫恒自杀。即使毛泽东还可以沉默，林彪与几位老师和副总理已经不能没有愤慨之意了。

如果说对于1966年10月前后，各级党政机关受到的冲击毛泽东还可以拍手称快、林彪还可以回避矛盾、几位老师和副总理还只能发点牢骚的话，到了1967年2月各级军事机关受到冲击，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因造反派的揪斗而“东躲西藏”，而且各地军队的负责人如许世友、韩先楚已经气愤已极的时候，他们谁也无法袖手旁观了。

二、“二月逆流”在中央和地方的表现

“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现有：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的“大闹京西宾馆”；1月28日，“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2月11日和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

为了表现“老一辈革命家同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26），中共官方对这些事件进行了黑白两极化的曲解，尤其歪曲了林彪在其间的作用。而对于几位老师和副总理以及周恩来的一些言行则作了掩饰，因为这些言行在官方后来的观点中是“缺点错误”或者“违心的话”。

“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则表现为军方对造反派的整肃和镇压。如果说中共官方对“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现作了曲解的话，那么中共官方对“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的表现则是加以掩盖，因为这里有许多复杂的矛盾、血腥的场面，即使完全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来看，也很难分清“敌我双方”和“谁对谁错”。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的“大闹京西宾馆”，其焦点是关于揪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其实质是文革在军队中造成的动乱应当达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本人对于“文革在军队中造成的动乱应当达到什么程度”是不十分确定的，对于是否要打倒萧华也是犹豫的，这种犹豫一直持续到1967年的夏季才见分晓。

中央文革一方，出于自身的机构的利益，希望把文革的烈火烧到军队，把动乱的程度加大，

所以支持揪斗萧华。而出席会议的军队的领导，则有不同的打算：军方作为一个整体，出于自身的机构的利益，希望军队稳定。在机构稳定的前提下，要“升一批人的官，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那么，升哪一批人的官，罢哪一批人的官，保哪一批人的官，不同的山头又有不同的想法。在“大闹京西宾馆”的具体场合，叶剑英希望保萧华，而当时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是站在中央文革一边，赞成揪斗萧华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以及其他一些人，由于过去的一些个人因素，也是这个态度。

因此，在“大闹京西宾馆”的过程中，既有军方整体与中央文革的对抗，也有从徐向前和叶剑英的对抗体现出来的军队各山头之间的矛盾。

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在与中央文革的对抗中“徐帅一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落在地。叶剑英怒不可遏，用拳头连连捶击着桌子”。〔27〕

实际情况是徐、叶两人在是否要揪斗萧华的问题上拍茶几、捶桌子，相互对抗。

《叶剑英传》中隐讳地写到了这一点：

“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震摔了。”

叶剑英“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28〕

《徐向前传》的描述是：

“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他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29〕

当时在场的吴法宪后来证实：“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出于责任，和陈伯达一起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于是引起两位元帅之间的对抗。”〔30〕“与会的军中高级将领见两位老帅对拍桌子，谁也不敢说话，有的见势不好干脆溜走了，一时会场大乱。”〔31〕

对此，王年一含蓄地说道：“军队高级将领的抗争极为复杂”。〔32〕

林彪的本意是保萧华，认为“萧华是总政治部主任，不能轻易点名打倒；这样大的事必须请示主席”。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态度不断反复，所以代表林彪出面的叶群的态度也不断反复，直到1月20日深夜毛泽东表态保萧华。〔33〕此后，林彪和江青大吵一场〔34〕，甚至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35〕。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了军方高级将领，“一方面要求军队要站在革命派一边，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又耐着性子听取了军方将帅们诉说挨整被斗的情形，表态说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分裂。”〔36〕参加过接见的陈再道后来说他当时得到的印象是：毛主席“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我当时的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37〕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在1967年1月28日颁布了“军委八条命令”（38）。照中共官方的说法是：“经过老帅们的努力，终于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分送给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清去，一起对八条命令作了仔细研究。他认为八条很好，并提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戴高帽子的规定。林彪也表示同意。”（39）

王年一的说法是：“徐向前当时是全军文革下组组长，提出要制定这个文件”（40）。然后引用了徐向前在他的自传《历史的回顾》里的描述。徐向前的原话如下：

“我们心急如焚，几次打电话找林彪，他都不见。我实在憋不住了，干脆去‘闯宫’。一月二十四日晚饭后，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林彪的秘书见我突然到来，不便阻挡，领我去会客室，林彪、陈伯达正在交谈。我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林彪连连点头，说：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接着，他说请叶、聂来研究一下。陈伯达便起身告辞。叶聂来后，都赞成七条。确定由叶、聂和我去钓鱼台，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我还特意打电话给陈毅同志，请他到钓鱼台开会，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

我们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人都在，陈伯达也在。他们把周总理也请来了。我讲了产生这个文件的因由，让人念了文件内容，经反复讨论获得通过。

‘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提议交住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讨论一下，征求意见。大家讨论中，鉴于昆明军区曾反映过有的高干子女参与抄民主人士的家，影响不好，建议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我们采纳，‘七条’遂变成了‘八条’。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拿到批示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据我观察，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算盘。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帐，对他不利嘛！”（41）

张云生的说法与此有很大的不同：林彪“于1月20日晚紧急约见叶帅、徐帅、聂帅和杨代总长，商量对策。根据大家的讨论，林彪归纳了九条，经他口授，林办秘书记录并整理出来，交给当夜召开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席会议讨论，准备以军委命令的形式公开发布。”……“第二天早晨，叶帅打电话给林办。叶帅说：‘我们昨晚在钓鱼台讨论军委命令的稿子，争论非常激烈。我们拿去的九条，通过了七条。’……”“中午，钓鱼台发来一份铅印的军委命令草稿清样。这就是昨天钓鱼台会议讨论通过的那七条。林彪听说后，立即约见主席。主席当面表示同意这七条，并提议再加一条，加强对干部子女的教育。这就是后来传遍全国全军的那个军委‘八条命令’。”（42）

《徐向前传》的说法与徐本人的说法大致相同，但是也指出草案最初时“九条”而不是“七条”，在钓鱼台“经讨论改为七条”。“后来，林彪把七条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主席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又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修改后的八条交住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同意照发。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43）

《聂荣臻传》的说法：“作为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这时实在坐不住了。1月24日晚，他和聂荣臻、叶剑英先后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这样乱下去的理由，要求规定出一些条条，以稳住军队。当晚，经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林彪同意后，叫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拿着这个命令初稿去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央文革

的讨论会一直开到夜里3点多钟，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江青等人知道这已经经过林彪的同意，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就将命令初稿送请毛泽东审定。1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地把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几位老帅请到中南海，详细地进行了研究，并在命令初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要严格管教好高干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内容。接着，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个文件。”〔44〕

《叶剑英传》的说法是：“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说：‘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限制才行。’1月24日晚，徐向前、叶剑英和聂荣臻先后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有限制，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林彪同意，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讨论，又报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进行研究，最后审定批示‘很好，照发’。”〔45〕

对比以上几种说法：张云生认为“军委八条命令”在林彪的积极倡导下形成的；徐向前本人、《徐向前传》、《聂荣臻传》、《叶剑英传》都说是林彪在徐、聂、叶的要求下拟定的，其中关于每个人的作用，说法各有不同。虽然说法各有不同，但都认为是林彪拟定在先，毛泽东批准在后，而不是中共官方说的几位老帅拟订、毛参与研究批准后，“林彪也表示同意”。而且从徐向前叙述的“万岁万岁万万岁”来看，林彪内心是非常希望有这么一个命令的。

2月11日和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的直接诱因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陶铸被打倒一事批评了江青和陈伯达。会后李富春将消息传播出去，再加上林彪与江青大吵，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受到了鼓舞，也觉得该出气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大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46〕

王年一、高文谦、纪希晨等人的书中均有关于这两次会议的部分内容。其中陈毅的话颇有意味。据王力说：在周恩来和康生对会议记录作最后整理时，陈毅认为记录歪曲了他的一些话，要求删去，被周恩来拒绝。〔47〕

“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体现为军方对造反派的全面回击，在很多地方表现为“二月镇反”。中共官方对此完全不提，似乎文革中根本没发生过这回事。王年一的书中略说了“二月镇反”几个例子〔48〕，但没有指明“二月镇反”是“二月逆流”在各地的表现。事实上“二月镇反”是文革中有极大影响的事件。

各地军方负责人在面对文革初期的混乱局势都感到非常的困惑，当军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时，他们的困惑已经变成了不满和愤怒。“军委八条命令”使压抑已久的军方拿到了反击造反派的尚方宝剑，纷纷对包围、冲击军队的造反派进行回击和镇压。除了“八条命令”之外，中央军委常常还有针对当地具体问题的电报、命令或通知，支持当地军方的打击造反派的行动〔49〕。

各地军方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和针对各地的具体命令，对造反派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镇压”，很多地方都抓了人。广东、福建、安徽、河南、湖南都抓捕了造反派骨干，取缔了一些造反派组织。其中抓人较多的有湖北、四川：武汉抓了两、三千人〔50〕，四川抓了近十万，仅成都就抓了两万〔51〕。对抗最为激烈的是青海，发生了“二二三流血惨案”〔52〕。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毛泽东对各地镇压情况的具体态度，但是据推测毛应该是默认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军队如此大规模的行动没有毛的认可是不可能的；同时，官方的舆论工具也对军队的行动表示了支持：

2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对那一小撮反动的首恶分子,要坚决镇压,绝不留情。”

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军委制定的方针政策,就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纪律。”“必须严格地、坚定不移地遵守这个最高纪律。”

又例如,中央文革对于镇压湖南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是表态支持的〔53〕。

所有这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是不可能不知道的。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的表态,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也不明确表态。

对此,张云生写道:“主席最初对(赵永夫处理)青海事件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主席已有过内部指示:对那些肆意以武力反对和冲击解放军的右派群众组织,当一再的说服工作和忍让态度不能奏效之后,可以进行镇压。”〔54〕

“‘二二三’当天,赵永夫通过电话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报告,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但不知为什么消息到了西宁大街上,‘叶副主席’变成了‘林副主席’。秘书向林彪报告说,西宁传说‘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林彪听了一笑了之,不加评论,不置可否。”〔55〕

军方对造反派的打击也是很极端的,造成不少的冤案。军方照样只有政治观点,没有法律概念。有时为了夸大造反派的违法行为,甚至采用栽赃陷害的手法。〔56〕〔57〕

到了1967年的3月,各地的形势显得稍微平静一些了。这时已经有上海、黑龙江、山西、山东、贵州五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58〕。在一些激进的造反派被镇压的省份,军方也在考虑解放一些领导干部,依靠保守派或温和的造反派来建立革命委员会。如果照当时这种局势发展下去,文化大革命可以按毛泽东的预想,在“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59〕

如果按1967年3月的状态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话,其结果与后来在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实际上的结果所差无几:军方在革命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配上一些文革前的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会在革命委员会中有一些代表,但没有本质意义上的作用。

略有不同的是:当时军方选择的群众组织代表是来自保守组织或温和的造反派组织;而后来实际上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群众组织代表来自温和的或激进的造反派组织,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群众组织代表在革命委员会中起的作用实在是很有限。而且,不论是来自温和的还是激进的造反派组织,大都在接下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运动中被清洗了出去,有的还又重新进了监狱。

然而毛泽东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认为这样的文革结局是“反革命复辟”,他要反击这股“从上至下各级都有”的反革命复辟逆流。〔60〕

三、反击“二月逆流”

第二次“大闹怀仁堂”是2月16日下午，当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了会议记录，几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他们，听取了汇报。

2月19日临晨，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会前曾“通知林彪去参加。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请假，派了叶群作为他的代表。”〔61〕

毛泽东在会上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62〕，对谭震林等人严厉指责，说“你们就是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是要刘、邓上台，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百分之九十七八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十一中全会决议你们都举手通过了。为什么执行起来有抵触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对文化大革命发难。”〔63〕

其中有一句话的确是说到了点子上：“十一中全会决议你们都举手通过了。为什么执行起来有抵触呢？”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64〕

毛泽东此话的用意完全在于离间林彪与其他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将林彪拉到自己一边。所谓“他的地位也不稳当”、“有人要夺他的权”，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

为了拉拢林彪，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之前曾“特意把叶群找来单独谈话，作了工作”，“并特许叶群今后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而后“又专门指派江青代表他去做林彪的工作”。〔65〕

毛泽东向林彪发出的这些信息，在一个月之后得到了林彪的回应。但在当时，林彪的反应仍然任然是被动的。例如：在第二次大闹怀仁堂之后，谭震林给毛和林彪写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信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66〕，而林彪也就只在上面批写了“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67〕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指责，并没有上纲上线。

又例如：2月20日，当江青和王力向林彪汇报16日“大闹怀仁堂”的情况时，林彪也就“只讲了两句话：‘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陈伯达只是一个书生。’”〔68〕

毛泽东在对几位元帅和副总理的“大闹”进行反击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全国各地出现的军方镇压造反派的现象，认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69〕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也积极行动起来，发动造反派起来策应。

首先是在北京，3月14日，首都红代会举行十万余人的示威游行，主题是“痛击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示威中的口号有：“坚决打退从上到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把反攻倒算的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谭震林”。〔70〕〔71〕

反击浪潮随后逐渐传到全国各地，各地造反派纷纷喊出口号，要揪出当地的“谭震林式的代表人物”，例如：武汉要揪出“武老谭”陈再道〔72〕，广州要“抓广谭实际上就是抓黄永胜、刘兴元”〔73〕。

当林彪明确地知道了毛泽东反击“二月逆流”决心以后，开始响应。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74）。林彪在这次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到“复辟逆流”，也没有直接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提出指责。林彪以他独特的方式为文化大革命作了辩护，讲出了“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名言。

这篇讲话应该是代表林彪本人的看法的，根据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尽管秘书和叶群、林立果一起为林彪的这次讲话准备了稿子，但是，“林彪大都没有照用。他有他自己的一套。”（75）本文认为：林彪“三二〇讲话”是支持毛泽东反击“二月逆流”的表态。

毛泽东对林彪的“三二〇讲话”非常满意。4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说：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林彪同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讲话录音，应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播放。

林彪同志的讲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报告，对指导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导人民解放军正确地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一步取得胜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76）

4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将这份讲话的整理稿正式印发全国。

3月25日，在处理青海问题的会议上，林彪明确表态认为“青海问题是一个大案件，是实行法西斯的大镇压”、“是一个反革命政变”、“是带枪的刘邓路线”。

在解释前一段时间的不同态度时，林彪说：“前几天我们没有调查清楚，只听了赵永夫的谎言。原来他们把问题完全弄颠倒了。”“赵造谣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总理也打了电话，（总理插话：根本没有那样的事）。他说打电话‘打得好’，都是捏造。”

与此同时，林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军队的看法：“我们的部队大多数是好的，但确有坏人，不但青海有，总政、总参、总后，各军也有，……”，“三个总部、空军、海军确有坏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空军就会被坏人夺了权。他们不是把地位、人选都安排好了吗？海军主持工作的几个人也会被夺权。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向我们猛烈进攻。总后也是这样，黄克诚，洪学智和他们的爪牙，就抓了邱会作同志的小辫子，邱会作同志小偷小摸的事有，应该烧，但邱会作是个好同志。总政也有，总参也有，都是坏份子。”“这场文化革命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不是宗派斗争。空军的成钧就是要夺权的，这是贺龙搞的，这些坏家伙，你不斗倒他，他就斗倒你，不是什么宗派斗争。你想躲也是不行的，想防御也是不行的，只有进攻，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77）

这是林彪就“升哪些人的官，罢哪些人的官，保哪些人的官”向毛泽东发出的信息反馈。林的信息以后得到了毛的正面回应。

从三月下旬开始，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明显的逆转：

1967年3月2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其中专门提到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决定为造反派“八·一八”平反，将“赵永夫隔离收审”（78）。

3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4月1日又转发该决定的附件，其中规定规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79〕〔80〕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81〕。

4月6日，中央军委发出的《十条命令》中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82〕这样就在实际上否定了1月28日的《八条命令》。

“军委十条命令”是林彪主动制定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说是林彪当着黄永胜的面口述的，“他一边思索一边说，黄永胜也偶尔插上一句半句，我做了记录”，最后，林彪“向我布置：‘把他整理一下誊清后给叶群，让她送文革去讨论一下。’“这正中钓鱼台那些人的心意，因此中央文革很快就通过了。”〔83〕

面对中央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态度，各地军方开始显得不知所措，随后在执行中央决定的时候都有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但是大都还是执行命令，释放了抓捕入狱的造反派。在面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要求他们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且要转向支持造反派的问题上，行动各有不同，中央对他们的处理也各有不同。例如：

福州军区、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军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都做了检讨，中央对他们的检讨都持肯定的态度。〔84〕对另外有些军区则进行了改组，如内蒙古军区〔85〕和成都军区〔86〕。

也有的军区一直对中央的指示怀有抵触情绪，其中抵触情绪最大的当然是武汉军区。直到5月中旬，武汉军区虽然释放了大部分被捕的造反派骨干，但仍没有释放一些主要负责人。同时拒绝认错检讨，并且仍然坚定地支持保守派。后来为了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亲自南下，终于酿成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

四、反击“二月逆流”的后果和影响

在毛泽东“无产阶级的震怒”之下，几位老师和副总理“一个个面面相觑，没人敢吭声”。〔87〕

“毛泽东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并分别同他们几个谈话。”“2月9日，周恩来、李富春同陈毅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批评。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同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同徐向前谈话。”〔88〕

此后，“根据毛的决定，中央政治局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89〕被批判斗争的甚至还包括这些人的家属。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反击“二月逆流”直接后果是几位老师和副总理“靠边站”，“中央文革

碰头会”取代了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国务院碰头会”来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为此江青曾取笑说：“你周恩来也得来开我们这个碰头会，因为你那个碰头会已经不起作用了。”〔90〕周恩来也只好说：“以后你们做决定，我给你们办事。”〔91〕

由于几位老师和副总理只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作法，并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所以毛经过考虑，认为还是需要这些人：一来刘少奇的案子还没最后搞定，二来这些人在各地军方中还有相当的影响，所以，毛泽东接下来又对这些人做了一点安抚：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开“团结会”，说几句安慰的话，让他们于1967年的“五一节”在天安门亮相。

既然毛泽东要做好人，林彪也就没有必要作恶人。在得到毛的同意之后，林彪派黄永胜和吴法宪到几位老师和副总理家去告知他们：毛已同意“解放”他们了。但是，谭震林仍然没有得到“解放”。〔92〕除谭震林以外，其他六位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都进入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毛的这些做法与他对各地军方负责人的做法是一致的：

尽管各地军方对造反派的镇压要比文革初期的工作组厉害得多得多，打击面也广的多，但是毛对他们的态度却是比对工作组缓和的多，只是说：“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93〕

又例如对成都军区，毛泽东说：“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94〕

毛泽东在纠正各地军方对造反派的镇压，为造反派平反的同时，一面要求军队转向支持造反派，一面要求造反派不要和军队对立，要求各造反派群众组织团结起来实现“大联合”“三结合”。

尽管4月6日颁发的“军委十条命令”在事实上否定了先前的“军委八条命令”，毛泽东还是希望“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95〕并且要求造反派：“我们要遵守‘八条’，解放军得遵守‘十条’”。〔96〕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稳定军队的具体办法，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通过哪些人来稳定军队。王年一曾就此指出：毛泽东在1967年4月间定下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决策：“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稳定北京军内的局势。意图是：通过稳定北京军内的局势，达到稳定全军的局势的目的；通过稳定全军的局势，达到稳定全国的局势的目的。……大概以1967年5月13日为起点，实行了这个决策。”〔97〕

这个决策体现在对“五一三事件”的处理。“五一三事件”的经过情形，王年一、纪希晨、严家其〔98〕都有叙述，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中专门有一章介绍〔99〕。王年一的文章《“五一三”事件——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100〕的分析尤为精辟。

在处理“五一三事件”的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林彪坚决地支持了保吴法宪、李作

鹏、邱会作的保守派，即“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而中央文革却一反常态，没有继续支持他们以前一贯支持的反对吴、李、邱等人的造反派，即“三军冲派”。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决策，一向“被动”的林彪不可能这么坚决地支持某一派群众组织，一向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也不可能这么迅速地转向的。

本文要专门指出的是：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策、之所以决定“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来稳定军队，是和林彪积极支持反击“二月逆流”的态度分不开的。

林彪在支持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给毛泽东发出过信息，对于升哪些人的官、罢哪些人的官、保哪些人的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五一三事件”前后，毛泽东对于林彪的信息给与了回应。回应的结果是：在空军，保了吴法宪的官；在海军，升了李作鹏的官；在总后，保了邱会作的官。（101）不仅仅是如此，在各大军区的人事变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哪些人升官：

- 1967年3月，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梁兴初升任成都军区司令员；
- 1967年5月，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调任成都军区政委；
- 1967年7月，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升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 1967年7月，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升任武汉军区政委（连升三级）。（102）

毛泽东的这种有利于林彪的回应，是林彪坚决支持反击“二月逆流”的结果。所以林彪后来说：“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总后当权派中的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海军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也是被整。吴法宪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到甜头。”（103）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毛泽东依靠林彪等人来稳定军队的重要性。如果当时不是依靠吴、李、邱等人，以及“三军无革派”的话，军队各军、兵种、各总部仍将是一片混乱，到“七二〇事件”爆发时局面将变得无法收拾。

以后毛泽东和林彪的一段对话，颇有意思：毛泽东对林彪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都按个人的意见办，军队怎么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个人的意见办，这样军队就不象个样子了。还是你说的：‘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林彪回答说：“这两句话是很普通的两句话。还是主席说得好，‘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要说对的就执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行动起来各行其是，不就乱了套了吗？”（104）

但是，反击“二月逆流”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并没有按照毛的主观愿望发展，还真是“乱了套了”。毛的初衷是：军队支持造反派，造反派团结起来，解放一批干部，实现“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达到天下大治。然而，局势的发展却是：

群众组织并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更加对抗，在“二月逆流”中受到镇压造反派组织与协助过镇压的保守派组织势不两立，例如在武汉；有些地方保守派组织已经瓦解，但是造反派组织又分裂成对立的两大派，仍然势不两立，例如在成都。

军队也卷入了群众组织的纷争，支持某一派，甚至不同的军队系统支持不同的群众组织。在解放干部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不同的群众组织要解放不同的干部，有些干部支持这一派，另外一些干部则支持那一派。

于是不同的军队系统之间的矛盾、不同派系的干部之间的矛盾、与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局面更为复杂。

军队和造反派的矛盾、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造反派中间不同组织的矛盾、不同的军队系统支持不同的群众组织、不同的群众组织要解放不同的干部，所有这些都被冠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甚至“国共两党的斗争”，使对抗越来越激烈，一直发展到1967年七、八月的全国性大武斗，真如林彪所说“‘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105）

五、结论

以上本文简述了文革中的“二月逆流”、以及林彪在这段时间的言行，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二月逆流”既表现为“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也体现为各地军方对造反派实行的镇压。

“二月逆流”的产生，在最初阶段时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许、林彪的支持。作为各地军方镇压造反派的依据的“军委八条命令”，是在林彪的主导下、几位老帅的参与和促成下拟定的，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当毛泽东认为“二月逆流”的结果将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时，他又对“二月逆流”进行了反击，并且拉拢林彪加入反击。林彪“被动”了一段时间之后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具体表现有“三二〇讲话”、三月二十五日针对青海问题的讲话、制定“军委十条命令”。

鉴于林彪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毛泽东决定以林彪及其老部下为依靠力量来稳定军队。“五一三事件”的处理结果体现了毛泽东这一决策。

□ 原载《百年林彪》纽约：明镜出版社，2007

注释：

（1）金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二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年，第152页

（2）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三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第130页

（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1981年6月27日

（4）《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发〔67〕147号文件 1967年5月7日

（5）同（2），第145页

（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发〔66〕267号文件 1966年5月16日

（7）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1967年1月30日

（8）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1967年2月3日

（9）《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发〔66〕515号文件 1966年10月5日

- (10)《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1966年1月2月3日
- (11)毛泽东《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7年1月27日
- (12)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
- (13)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北京春秋出版社 1988年,第26页
- (14)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80页
- (15)同(13),第40页
- (16)同(13),第58页
- (17)同(12)
- (18)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7年7月8日
- (19)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1967年1月8日
- (20)“天下大乱”最初是由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揪斗“牛鬼蛇神”开始的,后来在冲击各级党政机关的过程中,红卫兵分化为主动冲击的“造反派”,和反对大规模全面冲击的“保守派”或称“保皇派”。
- (21)《中共中央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结果的通知》中发[66]400号文件1966年8月14日
- (22)《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年
- (23)同(14)第123至125页
- (24)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年8月1日
- (25)虽然林彪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几次天安门讲话中都赞扬了红卫兵的行为,但本文并不认为这些讲话就是林彪本人的意思。这些讲话都是毛泽东授意、别的人写成、林彪照本宣读。
- (26)同(2)第139页
- (27)同(2)第133页
- (28)军事科学院编写组《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第409页
- (29)国防大学编写组《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年,第321页
- (30)金秋《权利的文化—文革中的林彪事件》(英文本)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95页(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3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 2003, 第196页
- (32)同(14),第207页
- (33)同(13),第65至68页
- (34)同(13),第163页
- (35)同(31),第197页
- (36)同(31),第196页
- (37)陈再道《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载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北京 1988年。陈再道的说法不确切,军委八条命令在这次讲话之后。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各地军方打击造反派也曾得到过毛的许可,至少在陈再道是这样理解的。
- (38)《中央军委八条命令》1967年1月28日
- (39)同(1),第153页
- (40)同(14),第195页
- (4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7年,第828页
- (42)同(13),第76页
- (43)同(29),第322页
- (44)北京军区编写组《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年,第344页
- (45)同(28),第410页

(46) 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1, 第269页

(47) 麦克法奎尔、沈迈克《毛的最后革命》(英文本)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6年
MacFarg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541

(48) 同(14), 第202页

(49) 例如: 在1月28日命令颁布的当天, 军委发出了给新疆军区的电报, 而后有在2月11日在此发出措辞颇为强硬的电报, 说: “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地回到本单位去, 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否则, 一切后果, 由冲击新疆军区的人员负完全责任。”(《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党委的二封电报》1967年1月28日、1967年2月11日) 三天以后, “福建前线部队”发表公告, 表示要“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 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 坚决实行纪律制裁!” 2月6日, 中央军委将此公告转发各军区“望参照执行”。(《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1967年2月6日)

2月8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对冲击广州军区各造反派的命令》, 命令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的造反派“立即撤退。……否则, 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2月1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制止昆明各军事学校机关冲击军区的通知》指出: 昆明军区“所采取的措施, 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应当坚决捍卫和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军委的八项命令, 立即退出后勤大院。……否则, 你们中间的负责人, 要对这一行动负责。” 2月17日, 中央军委公布《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信》, 信中指出: “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 一切严重后果, 由你们完全负责。”

(50) 《戚本禹王力接见湖北代表座谈纪要》1967年5月15日

(51) 《中央首长接见四川地区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4月3日

(52) 丁抒《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载《华夏文摘》第三三八期 z k 0 3 0 5 a

(53) 《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批示》1967年2月4日

(54) 同(13), 第96页

(55) 同(13), 第92页

(56) 同(52)

(57) 《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1967年3月24日

(58) 同(2), 第167页

(59) 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13日

(60) 毛泽东《关于要注意反革命复辟现象的批语》1967年2月28日

(61) 同(13), 第95页

(62) 同(31), 第207页

(63) 同(46), 第278页

(64) 同(14), 第216页

(65) 同(31), 第205页

(66) 同(13), 第71页

(67) 同(46), 第274页

(68) 同(46), 第280页

(69) 同(60)

(70)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首都红卫兵》1967年3月15日

(71)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1967年3月16日

(72) 同(37)

(73) 叶曙明《迟泽厚访谈(节录)》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四六六期 z k 0 5 1 1 e

- (74) 林彪《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20日
- (75) 同(13), 第101页
- (76)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播送林彪同志讲话通知》中发(67)123号文件1967年4月7日
- (77) 林彪:《关于青海问题的指示》1967年3月25日
- (78)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中发(67)110号文件1967年3月24日
- (79) 《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发(67)112号文件1967年3月27日
- (80)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中发(67)117号文件1967年4月1日
- (81) 《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1967年4月2日
- (82) 《中央军委十条命令》1967年4月6日
- (83) 同(13), 第106页
- (84) 例如:从1967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可以看到:“福州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同志最近表示,……: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平反’”,所以“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采取这个措施是好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欢迎韩先楚同志的这些表示和措施。”同时,告诉造反派:“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冲军区是不宜的,不对的,”
- 但对以往的冲击事件“不予追究”。针对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军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的类似文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和“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中发(67)151号文件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的山东省军区党委“关于向革命群众公开检讨支左工作中的错误的情况报告”》中发(67)175号文件1967年6月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批发“济南军区党委给山东省革命群众的一封信”》中发(67)182号文件1967年6月12日
- (85)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中发(67)126号文件1967年4月13日
- (86)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发(67)147号文件1967年5月7日
- (87) 同(31), 第207页
- (88) 同(46), 第279页
- (89) 同(31), 第209页
- (90) 同(30), 第105页
- (91) 同(31), 第212页
- (92) 同(30), 第106页
- (93) 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稿中加写的一段话》1967年4月1日
- (94) 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1967年4月23日
- (95) 毛泽东《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1967年4月20日
- (96) 毛泽东《对上海市革委会的指示》1967年5月
- (97) 同(14), 第286页
- (98)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年
- (99) 同(13) 第112页—第124页
- (100) 王年一《“五一三”事件——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载《华夏文摘》增刊第二五五期zk0104a
- (101) “九一三事件”以后梁兴初、刘丰受牵连而罢官,见(22)
- (102) 1967年6月,李作鹏任海军第一政委,见(22)

〔103〕同〔2〕，第157页

〔104〕林彪《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指示》1968年5月28日

〔105〕同〔13〕，第108页

~~~~~

## 【史林一页】

### 百问九一三（八）

• 舒 云 •

#### 41、潘景寅一个人能“扛”起256三叉戟吗？

空军34师的飞行员回忆：潘景寅在九一三事件前情绪低落，有人问他，他说落地总解决不好。潘景寅一直当领导，飞行相对飞行员就少，再加上性格的原因，在改装的三叉戟飞行员中，潘景寅技术不如团参谋长李克修和副参谋长陈联柄。只是因为潘景寅职务比他们高，李克修和陈联柄才成了潘景寅的“备份”。

潘景寅是作为干部飞行员培养的，开始飞行时岁数较大。曾在一次起飞时遇到“下马威”。自有飞机以来，飞行事故多发生在起飞和降落这两个阶段。飞机起降时高度低，容易撞上障碍物。万一飞机发生故障，飞行员也没有处置的时间。对飞行员来说，飞行高度和速度是飞行员的生命，飞得越低，速度越慢，越危险，稍犹豫就会发生等级事故。所以起落是飞行员的生死关。

那是1956年或1957年，到沈阳执行任务，潘景寅是机长，马和是副驾驶，赵政彬是空中机械师，机上还有空中通信、领航等。正赶上一场大雪，跑道中间的雪扫掉了一段，前面跑道上还有雪堆。潘景寅看了看，认为可以起飞，就滑出去了。滑了一段看跑道不够，又退回来，继续等了好几个钟头。因为没有扫雪机，全是人工扫，好不容易扫出1000米的跑道。空中机械师赵政彬认为跑道还不够，但潘景寅认为够了。按一般情况是够了，可是超压起飞，就起飞了。潘景寅用了加速度，到了雪堆跟前飞机还没有拉起来。眼看着飞机冲着雪堆扎进去，幸亏副驾驶马和身强力壮，用力拉了一把，螺旋桨把雪堆打得飞起来。飞机终于被拉起来了，平安上了天。该收起落架了，表示收起落架收起来的显示灯不亮。试了几次，都不行。原来雪堆把起落架上碗口粗的螺杆撞断了。空中机械师赵政彬建议先完成任务，因为飞机刚起飞，油还很多，必须耗掉一些才能降落，这样落地就是起火，火也不会烧得很大。

空中飞行了两个小时，几个人想办法，如何安全迫降？救护车、灭火车也早早停在跑道尽头，预防万一。落地时，赵政彬对潘景寅说，歪一点，用好的起落架接触地面。飞机一落地，赵政彬立刻把发动机关掉了，飞机虽然向一边偏，但总算没有人仰机翻。空军来人调查，算了个三等飞行事故。这件事非常典型地说明大型运输机出现问题要一起商量。如果不是大家努力，也可能就成了机毁人亡的一等事故。

分析潘景寅这几次险情，起飞时他太着急，落地时他又太着急。而这两个弱点恰恰造成他最后一次飞行成了不归之旅。如果他起飞时稍稍停一停，或者机组人员全上去，或者被警卫部队拦下，都走不成。而落地时，如果他不那么着急，再扩大一点盘旋范围，不就可以落在温都尔汗的土机场了吗？

时念堂回忆：潘景寅是专机师副政委，内向，不那么开朗，话极少。他的优点是沉稳，但也由此带来脑子有点“木”。他飞伊尔-18时，就飞得不精。1969年潘景寅驾伊尔-1

8 飞往山海关机场，“撞”上雷雨，下不来了，怎么也对不准跑道。那次我在后舱，上去把潘景寅换下来，这才让飞机落了地。陈联炳对我说了好几次，叫我快点飞三叉戟，我们说了不算，意思是潘景寅不行。

还有一次，空中发动机告警，潘景寅抬手就要关发动机，空中机械师把他的手打掉了，说你再看看。因为空中发动机报警，有真有假，潘景寅定睛一看，果然是假报警。如果空中关机，虽然还有一台发动机，总是增加了一半的危险。这又一次说明，大型运输机上多一个内行，就多一份安全的保证。

康廷梓认为，因为是外行，叶群和林立果的技术准备仓促，没有得到重要的机场资料，尤其缺乏蒙古边境的军用机场数据。机场数据包括机场的位置，跑道方向，跑道两侧导航台的设施，跑道的距离，电台的呼号频率及其它联络方式等。军用机场资料是绝密材料，不是与飞行有关的人员无法得到，得到了也看不懂。即使叶群问到了蒙古边境机场的分布，没有具体标到航图上，也不行，飞行员只能根据航图飞。

在林立果的准备中，最有用的就是周宇驰要到一份北京到乌兰巴托的航线图，以及三北地区的雷达分布图。周宇驰要蒙古周边的电台频率，这是对的。只有掌握了广播电台的地理位置，飞行中罗盘一旦接收到广播信号，罗盘指针就会自动引导飞机飞到电台上空。但这是领航员的工作，潘景寅不能离开驾驶台半步。三叉戟上特设师邵起良会使用领航员的罗盘接收设备。

三叉戟起飞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如加油等，离不开机械师，连飞机舱门的钥匙都在机械师身上。但一旦起飞动作完成，飞行中不发生故障，机械师就无用武之地了。所以三个机械师包括邵起良在机舱后面保护林彪，不可能帮助潘景寅操作。叶群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她懂俄语，所以她“大摇大摆”地坐到了潘景寅身边，冒充领航员。可是，叶群再“聪明”，又怎么可能引导三叉戟飞向平安？也就是说，在近两个小时的夜航中，没有人可以与潘景寅商量，一切的一切全由潘景寅一个人“扛”着。面对如此困境，再胆大的飞行员也会缩手缩脚。飞机一动就孕育着危险，哪怕万分之一的不小心，也可能导致机毁人亡。

航空专家通过数字分析发现，如果飞机持续夜间飞行，执勤时间越长，飞行员发生飞行事故的概率也越高。“不眠时间段”越长，存在的“隐患”就越大。特别是在一天的后半段，也就是下午至午夜、午夜至清晨，比前半日存在的危险更大。所以飞行事故多发生在下午或夜间，特别是机长在决策和程序方面的错误明显增多。为此，世界民航界对飞行机组的值勤时间和飞行时间及年龄限制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

在飞行这个复杂的系统中，飞行员始终是核心。当过“老飞”的人都知道，飞行是一项繁重的脑体并重的特殊劳动，劳动强度非常大，对飞行员的生理和心理要求极高。长久以来，四分之三的飞行事故都是由于人为表现不佳引起。七情六欲、疾病、疲劳、不舒适或焦虑等，都会影响人的主观能力及与客观环境的匹配和适应，从而产生不良的行为。所以飞行员睡好、吃好和心理平衡，是飞行安全的重要保证。

偏偏潘景寅在那一天晚上睡觉、饮食和心理都不好。从西郊机场起飞前他匆匆在候机楼吃了“盒饭”，到北戴河落地吃了一顿晚餐。也就是说，潘景寅两顿饭都没有吃好。而又一天中连着两次开飞机，傍晚执行了一个航班，从北京到北戴河，虽然是短途，不到一个小时的飞行，但加上飞行前的准备和飞行后的收尾，时间也拖得很长。之后他布置机组休息，他却没休息。因为他下午吃了安眠药，到了半夜，药劲早过了，更加清醒，所以一夜未睡，一直坐在调度室里，连着接了好几个电话。没吃好倒也罢了，没想到原来说第二天早上的飞行提前到半夜，而且那么慌乱，连机组人员也没到齐就飞上了天。

茫茫黑夜，上天就上天吧，夜航也不是一次两次。可是，为什么飞往蒙古？潘景寅心里的斗争没有办法不激烈。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北京有他温暖的家，他为什么要跑到国外？跑到国外他算什么？飞机肯定是开不成了，那他能干什么？想再回国也不可能。可是，又不可能永远在天上飞下去，油不多了，降落到哪里呢？飞机上还坐着“林副主席”，实在是心力交瘁啊。面临“弹尽粮绝”和“走投无路”，就是三头六臂，一切也已经无可挽回了。

#### 4 2、大型军用运输机能一个人飞吗？

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回忆：1971年9月13日凌晨，256三叉戟第一副驾驶陈联柄给我打电话，说潘景寅一个人把飞机飞走了。什么？一个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慢点说，飞机上还有什么人？除了潘景寅，还有三个机械师。不可能？我不相信，反复问了好几遍。我是飞行员出身，吃飞行这碗饭20多年，只有一名飞行员就飞上天，还从来没有先例。大型运输机不像歼击机，一个人就可以飞上天。大型军用运输机必须两个飞行员飞，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配合操作，就是本场训练，飞起落这样简单的科目，也应该全体人马都上，一个都不能少。更何况外场，又是夜间。

林彪专机这次飞行配备了三名飞行员，多配了一名副驾驶。而潘景寅，不仅“丢”下了两名副驾驶，还“丢”下了领航员和通信员。

歼击机在空中飞行的时间短，没有那么长的航线，光凭地面导航就完全可以。运输机航线长，加上空中有风的影响，飞机可能会偏离航线。所以除了地面领航外，必须要有空中领航。尚登峨吓坏了，这是林彪的专机呀，怎么一个人就飞了？机组都有谁？现在你身边还有谁？陈联柄告诉我，潘景寅把机械师叫起来加油，等调度室老李叫我们起床时，飞机已经滑出，没来得及加油，也没有到调度室办手续，就起飞了。这时参谋长梁璞上来了，我让陈联柄直接报告参谋长。

256三叉戟从西郊机场到山海关，开完飞行总结会，已经很晚了。因为第二天一大早还要飞行，所以机组除了潘景寅都抓紧时间睡了。要不是特设机械师郇起良打了个电话，机组的五位成员还在沉沉的睡梦中呢。郇起良打电话给调度室，说首长都到了，机组人员怎么还没到？调度室主任李海彬急了。

零时20分左右，领航员李成昌和同屋的第二副驾驶康廷梓被重重的砸门声惊醒，外面有人喊，快上机场，首长已经到了。机组的五位成员几乎同时从睡梦中惊醒，从床上蹦起来。

飞行员有个习惯，两只鞋尖一律朝外，蹬上就可以跑出去。可是，第二副驾驶康廷梓以紧急集合般的速度套上衣服，一只脚伸进皮鞋里，第二只脚还未来得及伸到第二只皮鞋里，就听见飞机发动机启动的声音。怎么会？他连鞋带也没系，衣服也没扣，就疯了一样冲出门。他的航行包就在飞机上放着，没拿下来，省了一道手续。黑暗中，他看见机组的两个老同志陈联柄和陈松鹤跑在他的前面。

刚跑出十来步，就听到发动机启动了，紧接着是加大油门的尖叫声。李成昌急得马上百米冲刺，还是晚了几十秒钟。在距离三叉戟还有50多米时，飞机滑行了。要是英制“子爵号”，发动机性子慢得像“老牛”，响半天，才能发动起来。偏偏三叉戟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运输机，发动机是个急性子，启动快。紧急情况下，除利用地面专用的启动车外，还可以利用飞机自带的压缩空气启动，不受地面专用设备的影响。内行人说，开车，滑行，起飞，机械师肯定帮了忙。平时机械师不管操纵飞机，但因为机组不全，三个机械师至少有两个在前面操作。潘景寅

利用机上设备启动中央发动机，然后一边滑行，一边利用中央发动机的压缩空气启动另外两台发动机，这就大大节约了起飞时间。只要滑行中做好驾驶舱内的各种检查，飞机一旦进入跑道，不需要停机，就可以加大油门直接升空。

被“丢”下的五位机组人员，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傻了一般，望着停机坪。眼看着三叉戟沿着跑道东头的滑行道越滑越快，接着就嗖地飞上了天。其实就差一两分钟。是不是在梦中？不是，专机确实是起飞了，停机坪上空空的，飞机早就没影子了。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李成昌顿时涌出一身冷汗。作为专机领航员，专机飞走了，你却没上去，万一因为没有领航员，专机出了问题，那可成千古罪人了。李成昌越想越害怕，四下望望，这才发现身边还有三个机组成员，两位副驾驶陈联炳、康廷梓和通信员陈松鹤也被专机“丢掉”了。

机长潘景寅在机组准备飞行的会上，安排得好好的，第二天一早起来到机场做准备，然后吃早饭。没想到才睡下两个小时，一切全变了。256三叉戟编制了九名机组成员，四位重要人物没有上去。

服务员小魏因为要提暖水瓶打开水，动作稍慢了一步。她提着两个暖瓶，望着空空的停机坪，着急地说，我开水还没打，他们怎么就起飞了？

四位垂头丧气的“难友”顿时觉得自己失了职。陈联炳问，怎么办？李成昌是党小组长，潘景寅不在，他就是机组的头儿，他说上调度室。在调度室，陈联炳向空军航行局报告。所有的人都惴惴不安，潘景寅要把三叉戟飞到哪里去呢？

#### 4 3、苏联人为什么对温都尔汗坠机现场最积极？

256三叉戟是中国的飞机，坠机现场是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也就是说，中蒙双方应该是最关注的。但是奇怪，中国人最不积极，蒙古人还算积极，而与坠机现场毫无关系的苏联人却最积极。苏联人三番两次到温都尔汗坠机现场，拿走了他们想拿走的所有东西。为什么苏联人比中国人和蒙古人更积极？

九一三事件中，后起飞的直升机迫降后，缴获了大量的机密文件，256三叉戟随身有没有带机密文件呢？中国高层一时搞不清楚。但中共中央在给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第一个电报中，就提到未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蒙方转交我们。因为在视察现场，蒙方提出，是否只看不取，待视察完毕，统一移交，许文益大使同意了。但最后没有达成协议，现场遗物一件也没有移交。

蒙方一口咬定，在这架飞机上除9名遇难者的遗体外，没有发现装有其它货物的痕迹。但是很清楚，苏联人和蒙古人在中国人到来之前，已经初步整理过现场，大的东西没动，小件如枪支等都归到一堆。林立果从北京到山海关机场时，蓝色“伏尔加”拉了两趟箱子。“伏尔加”的后备箱特别大，能装不少东西。256机组人员回忆：当时装上三叉戟的大大小的箱子有20多个。到山海关机场时，除刘沛丰时刻不离身的几个手提包外，别的箱子都没有卸下。刘沛丰那几个宝贝手提包肯定是上了飞机，而且还多了好几个包。皮箱子不会烧毁，飞机上的机械师邵起良穿的皮茄克几乎完好就可以证明。这20多个箱子都“不翼而飞”了，在谁手里？蒙古？还是苏联？不知道，不过最大可能是被苏联拿走了。

关于256三叉戟上的20多个箱子，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苏联和蒙古至今都没有吐露一个字。但是可以肯定，关于林彪座机的坠毁，蒙古人和苏联人比中国人知道得更多。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新华社没有派驻蒙古的记者。1985年1月8日，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分社记者杨达洲从贝尔格莱德发回一条电讯。南通社社长米哈伊尔·色拉诺维奇最近对记者谈到蒙古方面向他介绍的有关林彪在蒙古摔死的情况。杨达洲回忆：年底宴请南通社领导。南通社社长色拉诺维奇与我年纪差不多，他曾任驻蒙古和朝鲜、中国三方的记者。在北京我们就认识，处得不错。色拉诺维奇说，1975年，当时任南共联盟中央执行书记的多兰茨去朝鲜和蒙古访问，指定当时任南通社驻京记者的他随团采访。到蒙古后，蒙古通讯社原驻京记者、当时任蒙古党中央某局局长的那木斯莱邀请色拉诺维奇夫妇到家里做客。那木斯莱的妻子自称是汉学家，在蒙古公安部主管中文处。据那木斯莱的妻子讲，她从头到尾参与处理林彪飞机案。黑匣子先在蒙古人手里，因为蒙方老提抗议，害怕中国说是它打下来的，这样，她才有机会听到黑匣子。从“黑匣子”的录音带上可以判断，机上人员在激烈争吵。跟地面导航站之间也有争论。过几分钟吵一阵，还有射击声。她断定飞机上有林彪，但最初苏联人不相信，后来他们要走了黑匣子。

不管怎么说，那木斯莱妻子说的黑匣子里的声音不对，256号三叉戟始终没有与地面通话，怎么可能与地面导航站吵架呢？新华社驻蒙古的记者王义民认为：完全是捕风捉影。

据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的文章披露：苏联人说，256三叉戟的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与地面的通话。确实，256三叉戟就没有与地面通话。如果有地面领航，256三叉戟完全不必冒那么大的危险迫降野外。但是，有没有机内说话的内容呢？

苏联人卖了个“关子”，没有说有，也没有说没有。到底有没有呢？因为摔毁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的这一架三叉戟不是一个简单的飞行事故，而成了政治。加上本身这一架专机就是高度机密，致使黑匣子更加复杂化。不管怎么说，只要黑匣子能开口“说话”，中共党史上最大的谜底就可能被揭开。

#### 4 4、潘景寅为什么不叫机组一起准备飞机？

256三叉戟慌慌张张起飞了，却“丢”下了五位机组成员。带着一大堆问号，五位机组成员又往调度室跑，看哪儿飞。目标290度、100公里，目标315度、150公里，250公里……不久目标消失，五名机组人员茫然回到山海关机场招待所。

不过在调度室，他们总算搞明白了一件事，飞机上只有机长潘景寅和三个机械师。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地起飞？没等机组全上去就慌乱起飞，能保证安全吗？

专机组都知道，准备飞机从来都是全机组一起准备的。飞机落地首长走了，机组还不能走，还要检查飞机，查得很细，每个地方都要查到。检查完了还要塞上各处的“眼”，罩上蒙布，才能回去休息。飞机尤其是专机，不像汽车，上了车就开。飞机复杂得很，冬天夜里那么冷，要提前一个小时准备好，加温开车。准备时间起码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打开蒙布，取出塞好的“眼”，然后发动机试车，每个部件检查到，良好了，才能放心。剩点时间还要拿抹布和汽油，里里外外擦。然后在机场待命，等待首长。要是发现故障，那时间更长。试车排除故障，排除不了，任务没了，一天也是它，两天也是它。那时设备陈旧，不像现在换上个部件就完事，那时得慢慢修。所以专机组最辛苦，没白天没黑夜。要是在家，还好一些，地面有一套设备，机械师都在。在外场，就靠机组几个人，必须全体到外场，大家一起上阵。对于专机组来说，无论干什么，都是机组人员一起行动。可以说，这是一条铁的“纪律”。很奇怪，为什么潘景寅只叫住在同一房间的三个机械师起来准备飞机，没叫其它的机组成员呢？

9月中旬的北戴河，晚上已经很凉，康廷梓只穿了布飞行服，感到挺冷，睡觉时就顺手把窗户关上了。虽然关上了窗户，但是只隔一道墙，他睡觉又轻，应该能听见潘景寅叫三个机械师起床，为什么一点也没听见呢？说明潘景寅叫三个机械师的动作很轻。

是故意不叫，还是因为太匆忙？因为机上的四名机组人员全部死亡，黑匣子又一直没有露面，所以只能是猜测。有人反映九一三事件前潘景寅情绪低落，说他表面上老实，但很有心计，想问题比较多，有些思想不暴露。潘景寅以前爱说，自从反右时差点儿被打成右派，从此就十分谨慎了。（14）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当然不愿意夭折自己的政治生命。有人说他与周宇驰是航校同学，又一块调到空军，所以关系很好。可是并没有查到潘景寅和周宇驰搞阴谋的事实。有人认为是“精心安排”，潘景寅负有“特殊使命”，故意不叫全体机组人员。还有人猜测林立果打电话给潘景寅，说机组人员越少越好，人多了不好骗。怎么不好骗？上了天，又是黑夜，飞到哪里你怎么知道？

三叉戟装有各种先进的导航设备，但潘景寅一个人在空中驾驶飞机，不可能腾出手来再测量航线的资料。1点50分飞越国境，是地面雷达提供给指挥所的，潘景寅在空中，不可能那么准确。虽然“大方向”没错，但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飞行中，中间没有导航点对飞机的航迹进行校正，又没有地面领航和空中领航，还没有通信联络。而且又是后半夜，大部分电台广播都已经停播，地面上又黑乎乎一片，想准确地飞下去实在是太困难了。

按照逻辑，如果潘景寅知道飞往国外，他无论如何也要让全体机组一起上。或许潘景寅知道上边斗争激烈，但他做梦也想不到“斗争”会表现在他的飞机上。从林彪座机看，潘景寅傍晚执行了一个航班，从北京西郊机场到北戴河，虽然是短途，不到一个小时的飞行，但加上飞行前的准备和飞行后的工作，也很疲劳。之后他布置机组抓紧时间休息，他却一夜未睡，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虽然第二天一大早还要飞长途，但潘景寅并不担心，他知道机组还有两个技术高超的副驾驶陈联柄和康廷梓。有他们两个撑着，潘景寅完全可以放心。本来开完飞行后总结会已经很晚了，而林立果半夜突然命令给飞机加油，潘景寅当然要考虑，三个驾驶员都休息不好，这飞行安全怎么保证？能让他们再多睡一分钟也好啊。所以他轻手轻脚只叫了三位机械师起来加油，让两位副驾驶多睡一会儿。但没想到，林彪的“大红旗”超速来到山海关机场，致使一个机组被生死永远相隔。

#### 45、如果三叉戟“赖”在山海关机场呢？

现在想，如果飞机“赖”在机场，会是个什么情况？时任苏共联络部中国处处长库里克后来说：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苏联，中苏之间的麻烦就大了，也许不仅仅是一场边境冲突了。

有人说，如果不飞，潘景寅就是英雄飞行员，甚至整个专机团都要立功。或许256三叉戟摔在国内，空军34师不会牵连那么多的人。那么，潘景寅为什么要慌慌张张起飞呢？空军34师师长时念堂说：“鬼”催的，一个人怎么飞？没法飞，迫降是必然。

叶群和林立果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潘景寅也看见林彪上了飞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叶群命令快起飞，潘景寅怎么敢不起飞？为什么不飞？说到底，你飞行员不就是相当于汽车司机嘛。首长要专机，不光林家，都是随叫随到。专机没有起飞时间，首长来了就是起飞时间。每次都是机组先到机场等首长，都习惯了，从来没有首长到了而机组还没到的先例。

只有一个飞行员和三个机械师，就把这么大型的运输机“捅”上了天，实在不可思议。不

要说调度室没有给命令，跑道灯也没有打开，而且两个副驾驶和领航员、通信员都没有上来，飞行条例规定，机组不全不能起飞。不要说专机，就是普通的航班，也从来没听说机组人员还没有到齐就飞了的。本场训练，飞起落这样简单的科目，也要等机组人员齐了才能飞，更何况是在外场，又是夜里。飞机缺少副驾驶、领航员、通信员，一个人怎么就敢大黑天的起飞呢？

叶群和林立果再催，也要等机组人员全上来再飞啊。急也不急这三两分钟嘛，大飞机可不比汽车，如果潘景寅拖延，林立果有可能打死他吗？林立果也要想想，打死了飞行员，谁会飞三叉戟？他能开“大红旗”，可是他都没开，因为车上有他的父亲林彪。三叉戟他只会坐，不会驾驶。所以他敢打死潘景寅吗？当然最后“鱼死网破”，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还没到那个程度，潘景寅稍微解释一下，等个一两分钟，机组就全到了嘛。

潘景寅可以说发动机有故障，要修一下。虽然林立果学过开飞机，但三叉戟这样的复杂大飞机，他再有本事也挪动不了。潘景寅也完全可以借口机组不齐，不能起飞。大型飞机又不是汽车，一个人就开了到处跑。飞机飞了，还要保证安全。没有安全，飞上去不等于集体自杀吗？这点道理林彪一家也不是不懂，以前坐飞机，一家人从不坐在一架飞机上，就不怕全家覆没嘛。潘景寅把没法飞的道理讲了，他们肯定不会再“催命”，前后差不了几分钟，毕竟“安全第一”啊，再急也会“耐心”等机组人员到齐。

潘景寅的二女儿潘鹭回忆：爸爸喜欢唱京剧样板戏。他手巧，做了很多毛主席像章。“文革”初很多人造反，他就自封“保皇派”，绝对服从上级。那时弟弟潘鹏一两岁，爸爸抱着他看游行队伍，他学着喊打倒打倒。爸爸马上制止，说别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你爸爸就是个“保皇派”。潘景寅家乡的人说，老潘忠实，胆大，偏偏又不善于“演讲”。由此他打破了中国航空运输史上的记录。

本来空军司令部想把潘景寅调到机关的，调令都来了。1969年我国从巴基斯坦首批买进四架英制三叉戟，编号252、254、256、258。因为这批三叉戟，潘景寅没走，以民航身份参加了与巴基斯坦的购机谈判。之后，1970年6、7月，潘景寅带着西郊机场包括飞行员在内的各工种30多人，到广州学习三叉戟的飞行和保养。潘景寅由巴基斯坦飞行员带飞，进行了三叉戟的改装。行政上潘景寅是专机师副政委，在机组中年龄、资历都是排行第一，业务方面更是三叉戟的技术权威。所以，他当然是中国三叉戟的鼻祖。

吴法宪回忆：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临走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这是误传）。我感到情况严重，不过还可以挽救，北戴河到山海关还有几十分钟的车程，我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专机不能起飞，潘景寅满口答应。胡萍也给潘景寅打了电话，飞机一概不准动。

按说，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命令潘景寅不要起飞，就不应该起飞了。但是，吴法宪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被批了整整一年，没完没了地写检讨，空军很多人都知道吴法宪已经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了，还说吴法宪反林彪。在吴法宪和林彪面前，潘景寅当然听林彪的，而不会听吴法宪的。性格即命运，作为全心全意的“保皇派”，在那个关键时刻，叶群让起飞，潘景寅怎么可能不起飞？如果他稍微想一想，跑？往哪儿跑？既然有人要抓“首长”，跑到天涯海角也没用。可惜潘景寅非常紧张，“首长”让起飞，就快快起飞吧。可是上了天，飞到哪里你怎么知道？

机毁人亡，有着一系列的偶然。进口的四架三叉戟虽然是旧的，但这是我国第一次拥有大型喷气式客机。它航程长，可以从北京直飞海南岛或广州，不用中途落地加油。而且发动机在后面，噪音小。一投入使用，就“马不停蹄”，中央领导开会都喜欢坐。江青、邓颖超、谢富治、



华国锋、丁盛等都坐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看上了三叉戟，而林彪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三叉戟。1958年，林彪还没有到军委工作，坐飞机到昆明疗养。他觉得飞机比较好，首先是非常快，从那以后就开始坐飞机了。那时林彪的座机是“子爵号”，涡轮螺旋桨，时速450公里，比三叉戟慢一半，野外迫降，危险肯定比三叉戟小得多。

一个老飞行员的常识告诉他，只靠12吨半的油，如果飞到广州，油不够了，也不怕，中间可以随时落地加油。没有领航员也不怕，一个人也还多少有些把握，可以通过地面导航保持航线。可是他哪想到要在夜里飞往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盲人骑瞎马，稀里糊涂上了天，可是怎么稀里糊涂下来呢？256三叉戟在起飞时，似乎就注定了机毁人亡的命运。

（未完待续）

□ 选自舒云\_新浪博客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